

EVERYDAY
LIFE
IN
CHINA
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

福建河流及道路
沿途风光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英] 陆一约

(Edwin Joshua Dukes)

张跃军 刘为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英)陆一约(Edwin Joshua Dukes)
著;张跃军,刘为洁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615-6872-9

I. ①中… II. ①陆…②张…③刘… III. ①社会生活-史料-福建-近代 IV. ①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8762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章木良

封面设计 蒋卓群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2.25

插页 3

字数 276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译者简介 ●●

张跃军

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厦门理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十项，论文见于《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研究》等刊；有著编译作多种，曾获省级科研奖。

刘为洁

厦门理工学院副教授。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曾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研修。主持省级和市厅级社科研究项目四项，在《中国教育学刊》《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

同文书库丛书:

总 编: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执行编辑: 厦门市社会科学院

编委会:

主 任: 叶重耕

副 主 任: 何瑞福

委 员: 戴志望 温金辉 傅如荣 陈向光
彭心安 陈怀群 庄志辉 李建发
曾 路 洪文建 赵振祥 陈 珍
徐祥清 魏志坚 陈振明 朱 菁
李 桢

编辑部:

主 编: 何瑞福

副 主 编: 陈怀群 庄志辉 王彦龙 李 桢

编 辑: 陈夏晗



总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时代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要“记得住乡愁”，正是这深沉、浓郁的文化乡愁，开启了我们的精神文化之源。

厦门融会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整合了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认真梳理厦门历史文化脉络，既是厦门城市发展的内在精神需求，又是厦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时代重任。此次，同文书院推出“同文书库”丛书，对弘扬厦门地方历史文化、传承学术人文精神、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我想，重视厦门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有两个维度十分重要，即中华文明史进程的维度和全球文明史进程的维度，非如此不能激发出厦门文化的更大活力和影响。希望这套同文书库丛书的出版发行，能为传承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把厦门建成美丽中国典范城市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与文化条件。

叶重耕

中共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社科联主席

译 序

中国具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得地利之便，在对外交往和经济发展中往往占得先机。明清两个朝代的不同时期，对外政策松紧不一，提倡海上交通者有之，实行海禁者亦有之。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的晚清时期，福州和厦门成为通商口岸，西方人自此不断涌入福建。包括传教士、领馆和海关人员，以及临时访客在内的西方人士，在福建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他们经常走动，四处参观考察，写下了不少介绍福建地理物产、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文字，扩大了福建在世界上的影响。其中便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陆一约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该书作者名为 Edwin Joshua Dukes，按常规可译作埃德温·杜克，偶见译为“杜爱文”，应该是音义结合的译法；他有个中文名“陆一约”。总体说来，其生平资料非常有限，译者多方搜求，从英国朋友处辗转得到如下材料，出处应该是一本关于布里奇瓦特（Bridgwater）地方历史的书，是关于该地方名人艾迪斯·蒲伯（Edith Pope）的：“埃德温·杜克牧师服务于本地传道会。留存下来的照片显示他面容严峻，总是身穿一件挺着高领的衬衫，戴一副夹鼻眼镜，山羊胡子修剪得整

整齐。1884年他从中国传教归来，娶了本地姑娘艾迪斯·蒲伯。埃德温当时年过五旬。他不是无情的人，然而宗教主导了他的一生，儿子保罗记忆中的他自律甚严，不苟言笑。”^[1]遗憾的是，最早记录该材料的人没注明出处，但我们根据职业和本书的基调判断，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

鉴于坊间关于陆一约的资料甚少，而其家庭颇值得一说，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人其作及其家庭背景，我们经广泛搜罗，整理出一份相对完整的关于陆一约及其家庭的材料：

陆一约 1847 年 1 月生于伦敦的金斯兰 (Kingsland)，1930 年 4 月 21 日卒于米德尔赛克斯 (Middlesex) 的巴内特 (Barnet)。英国伦敦会 (全名伦敦传道会，属于基督新教教派公理宗) 派他到中国传教，主要在闽南一带活动。清光绪三年即 1877 年，陆一约在福建境内进行了一次长途游历，再加上常年在福建尤其在闽南传教的所见所闻，他据此撰写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以下简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一书，并于 1885 年在伦敦出版。

陆一约的妻子叫艾迪斯·玛丽·杜克 (Edith Mary Dukes)，出生时中间名蒲伯 (Pope)。两人 1884 年结婚，当时陆一约从中国传教的任上返回英国。艾迪斯是教师的女儿，天赋较高，20 岁时她通过函授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她 1898 年死于甲状腺疾病。陆一约 1907 年又与名叫哈瑞特·劳斯 (Harriet Rouse) 的 41 岁寡妇结合。

[1] 原文如下：“Reverend Edwin Joshua Dukes was the minister of the local Congregationalist Church. Surviving photographs show an austere man who always wore a high starched collar, pince-nez spectacles and a carefully trimmed goatee beard. He had returned from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and married local girl Edith Pope in 1884. Edwin was then in his 50s. He was not a cruel man but religion dominated his life and Paul, his son, remembered him as puritanical and cold.”

陆一约育有5名子女。长子艾希礼 (Ashley Dukes), 1885年5月29日出生, 1959年5月4日去世, 终年74岁。他是一名剧作家、批评家和剧场经营者。其妻子玛丽·兰伯特 (Dame Marie Rambert) 曾获大英帝国女性爵级司令勋章 (DBE), 外孙艾丹·安德鲁·邓 (Aidan Andrew Dun) 目前是一位活跃的诗人。艾希礼1933年建立了水星剧院 (Mercury Theatre), 其创作的剧本也出现于百老汇的舞台上。以其命名的剧团 (The Ashley Dukes Company) 致力于推动戏剧创作和演出, 以及青年演员的培养。水星剧院曾上演艾略特 (T.S.Eliot) 的《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 却因艾希礼不喜欢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而拒演其戏剧作品。

长女艾琳·凯瑟琳·杜克 (Irene Catherine Dukes, 1887—1950), 一生病弱。关于她的资料基本找不到。

次子保罗·亨利·杜克 (Paul Henry Dukes) 在兄妹中最有名, 他1889年2月10日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 (Somerset), 1967年8月27日逝于南非的开普敦, 终年78岁。他曾在拉脱维亚担任语言教师, 后因通晓俄语, 被英国军情六处招募为间谍, 派往俄罗斯帝国 (Imperial Russia), 公开身份是彼得格勒音乐学院 (Petrograd Conservatoire) 的钢琴演奏家, 并担任著名指挥家和作曲家阿尔伯特·科茨 (Albert Coates) 的助手。他长于伪装, 被誉为“千面人”, 常变换身份, 甚至混入苏共机构内部, 获取苏共高层的信息并传递给英国情报机构。作为当时英国在俄唯一的间谍, 他曾帮助数百名白俄知名人士逃离苏联监狱, 把他们偷偷转移到芬兰。他因此成了英雄,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 (George V) 称他为“最伟大的士兵”, 并于1920年封他为高级英帝国勋爵士 (KBE)。他是迄今唯一因为间谍活动被

授爵位的人。他后来成为一名作家，写作主题多是关于其间谍生涯，以及瑜伽等养生活题。他是瑜伽在西方的引进者之一。

三子库斯伯特·杜克（Cuthbert Dukes, 1890—1977）是位名医，191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他是病理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被授予官佐勋章（OBE）。战后他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细菌学教授。他在结肠癌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并乐于帮助患者，但根据贵格会信仰，他拒绝了所有的荣誉。

幼子马库斯·布拉登·杜克（Marcus Braden Dukes, 1893—1936），曾赴马来西亚吉隆坡担任职务，但不幸在任上离世。

二

陆一约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认为是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描述晚清福建民众生活空间的三本主要著述之一，另两本分别是：美国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以及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的《生活在中国人中间》（*Life Among the Chinese*）。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记录了陆一约自19世纪70年代来华，在福州、厦门及闽江一带传教近十年的见闻，是研究福州、厦门开埠后基督教传播及闽江流域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最早向西方介绍福建社会情况的著作之一。该书1885年在伦敦出版，包含一些插图和历史老照片。译者所依据的是伦敦圣教书会（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于1885年印行的版本，作者署名行下附两行说明：“地图及插图作者手绘。”该书最近的一版入选2011年2月出版的“历

史收藏主要来源”丛书之“世界历史图书”(亚洲及远东部分),平装,为普及型图书。该套丛书规模庞大,计收著作1200种;主题广泛,涉及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宗教、语言、艺术、政治、军事、外交、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属于国别及区域研究,如标题所示,主要是关于亚洲及远东;个别总括性的研究之外,多数是国别研究,涉及亚洲尤其是远东地区的每个国家,其中日本、俄国、印度出现频率最高,亦有数种关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等)。温特沃斯(T.H. Wentworth)在总序的开头便称,这套图书“代表了关于亚洲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的历史性作品”。

能够入选这套立意宏大的丛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完全符合丛书设定的标准,反映了中国尤其是福建在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形。在孔夫子旧书网,该著的英文版开价在千元以上,其价值可见一斑。此前并无中文译本,因此很有必要推出中文版,让其以描写对象本土的语言出现,以还原其应有的意义,使其发挥本应有,但长期未能彰显的重要价值。

该书英文版中收木刻版画及插图50幅,其中卷首的“厦门鼓浪屿”一图被后世广泛引用。该书计13章,详细介绍了福建各地的街市、道路、交通、客栈、社会习俗、宗教崇拜、风水、学校等情况,并附有一些手绘图片。该书语言简明,语调较为轻松活泼,在行文风格上与传教士作品常见的严肃深奥明显不同。

该书建立在广泛的观察之上,视野所及,几乎囊括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市井百态,风俗民情,礼仪习惯;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普天同庆的春节,无处不在的风水,别具一格的教育体系;等等。作者深入福建旅行,亲历水陆交通到客栈住宿的各个环节,对底层生活的了

解透彻而精微。作为传教士，他尤其关注宗教事宜，对本土的庙宇道观，甚至包括圆寂僧侣的茶毗过程等都多有描述。每章各有侧重，而各章拼接起来则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幅完整而鲜活的图景。作者擅长小处着眼，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视角，一斑窥豹，由树木而及森林。例如，第一章“街道上的行走”，通过在当时闽南小镇厦门街头的走动，呈现了一幅市井百纳图。

三

刘东在《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中指出，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不仅要面对西方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尴尬的是，还要面对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的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的中国研究是必要的，能为我们提供不一样的视角。说起海外的中国研究，一般指学术著作，而宽泛论之，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类著述也可归入其内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如实记录，而且包含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评述，其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为我们了解西方的中国观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西方世界弥漫着对华的敌意。该书与众不同，在“序言”中开门见山，直言中国很神秘，是“奇怪的国度”（序言，页2）^[1]。作者认为这片“伟大而神奇的土地”在商业、外交领域很出色，且能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他具有洞见地预测，美澳等将改变抵制使用廉价华工的态度；中国会迅速地变化，并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获利。他甚至预言中国将发生“伟大变化”，并改变世界历史。在西方对华普遍不友好的背景下，作者如此看好中国的未来，不

[1] 译序之引文均出自该译著，引用时在其后的括号内标注所引用译文的页码。

是曲意迎合，而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伟大的文明传统，使他透过并不如意的社会现实，看到了中国值得期待的未来。不同于此前西方对华观察的浮光掠影和居高临下，他深入中国社会内部，尤其是立足于民间和底层；不同于政客、商人或传教士，他是以旅行者的身份和角度体察中国社会，展示其日常百态。当然，虽然宣称“这本书无意于深刻，也不想解释一切现象”（序言，页1），但解释却是免不了的。作为最早的一批来华传教士，他低调行事，是为了被接受，为了稳定地生活，从而有利于其传教事业的开展。

陆一约较长时间在华生活和传教，算是半个中国通了。他深谙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总结出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窍门，要不紧不慢，随遇而安。在福建旅行途中需要乘轿子时，他利用轿夫急于做成生意的心态，优哉游哉，欲擒故纵，最终在讨价还价中占得上风。对于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他栩栩如生、不厌其烦地细致描摹，从大放爆竹、摆宴席、祭祖、祈求神祇保佑，到厦门的围炉习俗，以及各色人等的拜年方式、送礼及回礼，等等，不一而足。他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认为春节拜访的礼节在《礼记》中有明确规定（虽然该看法未必站得住脚）；他明白孔子的教导，征引孟子的观点，并从这些构成中国传统的根基出发来观察生活。他根据中国人的个性和性格特色，琢磨出具有针对性的传教方式：“中国人非常喜欢争辩，或者说他们更喜欢听别人争辩，甚至容许自己还没表态，却不时被人插话。因此，针对这类听众，采用幽默、温和的谈话是布道的最佳方式。”（页277）针对中国长期形成的在公共场合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传统，“教堂内的男女隔离非常必要，旨在抵制来自反对者无端的毁谤”（页278）。这些都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建议。

在华生活包括在福建的旅行经历，使陆一约对当地社会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福建多山，相邻地区由于地势阻隔，交通不便，语言区别很大，人们之间的沟通非常困难。作为在华传教的英国人，他对当地多样化的语言生态有切实的体会，利用在福建长途游历的机会顺便做了语言调查，并把厦门方言区往北推进。他悉心观察街头卖画艺人的创作，认识到中国绘画乃象征艺术，非关写实，不能往实理解。

作者观察到中国社会纷繁复杂、变化万千，人民生活艰辛，因此异常关注收入，他建议政府应该在社会建设上多投入，“就像伦敦、江户和其他一些城市那样，并且以一个更加开明的规划来重建，那将是个恩惠，使中国变得更加富足和干净”（页26）。类似的建议对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旁观者清”的建议，是值得肯定的。

该书呈现了作者在福建各地行走时所观察到的社会万象，涉及面十分广泛。由于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控制紧，传教多是在观念更落伍、经济更落后的乡镇进行。来自率先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英国的陆一约，骨子里是看不上福建乡下的。从书中不少地方的描写，看得出他对公共场合的混乱很不满意，例如：开篇第一章中的厦门（当时只是一个小镇）街道，到处脏乱差，道路狭窄且凹凸不平；街上的行人没有文明意识，不讲卫生，光着膀子乱晃，身上散发出混杂的味道；女子当街堂而皇之地洗头。他对神庙里的无序与杂乱非常失望；认为宗教场所（如厦门关帝庙）的参访者蓬头垢面，是缺乏对神祇的敬畏之心。他观察到吸食鸦片的普遍性（福建一半的成年男性深受其害），虽然该行为被普遍歧视。

作者认为，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运行体制大有问题。譬如，觉得路宽了是浪费田地，于是路况便十分糟糕。落后的观念拖

累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社会发展。民众缺乏公共意识和隐私概念（如当面围观并大声评论“番鬼”）；过于世俗，对物质的欲望强烈；听讲道时经常心不在焉，让人怀疑其对教义的真实态度。经过大量的观察，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与他们性格中最佳品质并存的，是一些恶劣庸俗的习惯，显示出有修养的道德感的遗憾缺失。”（页 121）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现象相当普遍，女性和男性在教堂中被隔开，女性坐在较差的地方；女性“在遗忘中沉沦，自我封闭于狭小的女性圈子里，远离了使人向上的影响”（页 129）。他深入观察社会运行体制，发现了官僚体系内部的问题，比如司法腐败，掮客不当牟利；地方官员薪水微薄，只得设法捞取外快；教育系统腐败，使得“以被认可的合法的方式获得头衔非常困难，导致官场腐败的巨大体制漏洞”（页 239）。

教育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人的思想观念，作者在第九章利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谈论中国当时的教育，认为问题多多：识字人口少，教育程度低；教学中注重记忆，缺乏对知识的追求；求学者的动机在于追寻仕途；等等。作者称：当时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了似乎“国民中最无知、最愚蠢和最不切实际的人”；绅士阶层的思想被束缚，难以接受新观点；“对人之本性的压抑而非释放，是中国教育的倾向和结果”（页 236~237）。这些论断来自“旁观者清”的冷静观察，是难得的谏言。

作者当然很明白，一味苛责是不明智的，他同时展现中国社会好的一面。此举或许是出于真诚，抑或是为了能在这片土地上立足，从而实现传教的目的，不无曲意迎合的成分在内。他盛赞“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因此中国人无可比拟地恰到好处、明察秋毫、品行端正。他们的著作教导他们以礼貌、节制和尊敬的态度对待私德

与公德”(页218)。他对底层劳动者(如街头的手工画家)的优秀品质和精良手艺不吝溢美之词。他赞赏中国的乡绅低调,和家里的仆人相处平等融洽。他夸奖中国人勤劳,并不失时机地以合适的形式休息和调整,而不是不休不眠。第五章专门谈中国人的习惯和礼仪,开头便称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常常不到位,这显然是为了回应西方对华的敌意和偏见。他指出中国人孝敬尊长,谦虚温良,热爱和平,温和宁静;相对于英国人的唐突无礼,中国人彬彬有礼,即使底层的人也举止得体,礼貌待人:他以中国驻英外交使节郭嵩焘的话,说明英国人“无德”,缺乏行事准则,并以某些在华英国人的行为为此做了注解。

专论中国教育的第九章中,作者引用来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博士的说法,指出中国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公元600年左右已开始授予学位,并通过科举考试来招收文武官员;虽然如今的教育水平比过去并无提高,但在基督教创立之前,中国人的知识水平超过同时期的犹太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孔孟等中国圣贤对世界知识和伦理的贡献,超越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先哲。“中华帝国在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持稳定(虽然革命频仍),也许正是由于孔子学说所固化的民族与社会情感”(页217)。“我们应该向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即具有高度伦理道德、备受尊崇的民族文献致敬。形成人们思想与生活的基础的那些文献,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页217)作者两个多世纪前对中国教育的观察准确且敏锐,其中蕴含的优秀特质是永恒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明智而公正”的道德观。

作为在华外国人,无论是出于出身背景、知识结构,还是传教事业的需要,他在行文中不时出现的中外比较是很自然的。作者称,“民

族偏见是最为苛刻的情感之一，它以自己的标准要求陌生人，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它也最具欺骗性，妨碍我们看到习俗不同者的真正美德”（页 103），他在行文中力求摆脱民族偏见，持公允平实的态度，虽然这的确很难做到。游历途中住宿客栈，他对客栈的描写非常细致，把不同等级的各式旅馆和客栈加以比较，甚至比较英国的情况，认为“虽然这些旅馆跟我们国家的相比逊色太多，但我们应避免过于苛刻的判断。需要考虑我国与中国在社会结构的完善程度上的差异”（页 60）。这种看法无疑是客观和公允的，因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英两国，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差距明显，人们在此方面的感受也最为强烈。日常生活上，作者赞赏中国人的“简朴持家的生活观念”（页 61）；在服装的购置与穿着、食物的准备、房间的设施和装潢等方面，中国人务实，英国人则华而不实。西方对公共场合和私人领域的权利都很重视，而当时的中国对此则关注不够，例如，对于当街杂耍表演，中国人觉得是一种福利，愿意为此承受噪音和干扰，作者却认为这是对私人权利的侵犯。（页 15）这类事情看似很小，却反映了中西观念的差异：中国人隐忍、顾全大局，西方人却注重个人隐私，不愿牺牲个人利益以成全集体。

比较不限于中外，也在中国甚至福建不同地方之间展开。写到女性时，他比较了福建不同地区的女性：缠足限于厦门地区，而泉州的女人则不缠足，她们体格健壮，穿着时尚且大方实用，便于从事劳动。书中多次涉及南方和北方之区别，如在交通方式、客栈等方面。南方车少，大抵是因为多山地，很少有开阔的平整土地可供修路；加之财政窘迫，很难花大价钱克服地形不便的困难来修长距离的路。北方虽然土地平坦，但同样限于财力，路修得不多，在交通工具和方式上是